



陈焕镛讲课回忆片段录

陈焕镛在1947—1948年为广西大学农学院开西门选修课，植物分类学、植物学拉丁语。他是西大的名教授。选这两课的只有我是园艺系的，其余约10人都是森林系的学生，而旁听的教师却有六、七人之多。

陈焕镛幼年随母赴美，学成归国时29岁。因中文基础欠佳，归国后曾延聘私人教师教语文，但当我们听他讲课时，却觉得他一口的普通话比任何一个广东人讲的普通话都好。在讲台上的讲话和平时生活中的讲话一样，从容不迫，讲一句算一句，从不重复。所以，他讲课时表面上很慢，但你要把他讲的每一句都记下来，并不很轻松。

植物分类学虽然有讲义，但他并不按照讲义的内容及其次序照搬演讲。在我的记忆中，他讲授的重点是花。主要是各种类型花的结构，及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最后就讲花序。重要的名词术语都用英文写在黑板上。

因他威望高，讲演的内容准确不误，刻图入微，极富魅力，所以课堂上总是鸦雀无声，听者全神贯注。

这门课很重视做实习，做法是每一学生到室外自采一种野生的开着花的植物拿回课堂自己解剖查检索表，即讲义中的英文分科检索表。实习交给森林系的教师代劳，该系来听课的教师虽众，但书面负责安排和指导的主要是钟济新教授一人。

听了陈焕镛讲植物分类学的课，不知不觉地在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到了我参加研究工作之后的1957年，中科院和农垦部联合在广州举行（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会上陈焕镛做了（木兰科一新属，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的专题报告，我听了之后不但加深了脑子里原有的印象，而且对植物分类学的工作更加有信心。那时我已入了广西植物所分类室工作多年。

讨论会一开始便发了与会者的论文摘要。我见陈老要做这个新属的报告，心里嘀咕了一番：这报告咋做呀？纯粹是描述性的东西！怎知一当陈老登上讲台，开始他的报告之后，会场又如我们听他讲演植物分类学时那样，全场鸦雀无声，听得大家如痴如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简直是一个谜。我现在只能这样解释：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成熟的。讲植物的形态特征，自是对它有了深刻的认识，决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肤浅应付。听其言，使你相信他讲的可信可靠。加上他语言表达上的艺术。即使是简单的东西，也会使你感到神奇。虽然他还有很高的威望，使你不得不给他加上一些印象分，但这一点可能是次要的。

植物学拉丁语一课开在植物分类学之后。〔当注册组把这门课公布之后，在同学中便有这样的传说：拉丁语这门课要招收英语程度好的学生。我自问英语不算好。但陈焕镛已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便不知好歹的报了名。结果是只有我和同届的森林系同学陈德昭（现供职于华南植物所）二人被接受为该门选修课的学生。上课时我和陈德昭坐在最前面，后面也坐着一大帮森林系教师。同时又多了一个陈焕镛的侄女陈淑珍，即分类文章上外文名字为 F. Chun (Faith Chun) 的。〕

拉丁语也有讲义，名为（拉丁文文法初阶）ELEMENTARY LATIN GRAMMAR，又名 ESSENTIAL LATIN IN TAXONOMIC BOTANY，全为英语编写，用蜡纸打印，光文法部分就达75页，一页占一张蜡纸，共15章，虽然说是文法初阶，但亦包罗了文法的一切了。

上课时，陈老全用英语讲授，他同样是撇开讲义，按他另定的主意开讲。现在想起来，那才是初阶中的初阶呢，只有那样用最浅淡的语言讲出拉丁语最主要的特点，我们才能接受得了。象发音，名词的性别，词形变化，词的变格，形容词的词形和变格也跟名词变化等。

陈老对我们讲了一段时间，便对我们进行一次测验。一是发音，二是词的变格。发音的测验等于口试。

他在黑板上写出几个拉丁词，叫我们逐一读出来。变格的测验是用卷子写答案。我和陈德昭都正确做出来了。他很满意。在我的答卷上打了100分，他侄女有意见，说哪里能给100分？其实，陈老出的考题很浅，及格是肯定的，分数多少倒无所谓。但这一次测验，却给了我一个至今未忘的记忆。因为，我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体会到：在植物分类学拉丁语来说，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发音和词的变格（declension）了。在分类学界凡是发表过新种的同行怕是都体验过，对于拉丁文，只要弄通名词和形容词的变格便算可以。但对于拉丁文的发音，远没有那么受重视。好象拉丁学名读不读或读出准不准都无伤大局。这种状况，大大的降低了学术交流的质量。如果遇上外国人，简直无法进行，因为即使你身边还有翻译，他也无法解决，就算是普通的植物，他也只能翻出个中名来，如樟树、桂花、玫瑰等等。还有一个不利之点是不利于自己比较容易地把学名记住。试想你对它的发音读不出来，又怎能把它拼写出呢？除非你把它的拼写一个字母再一个字母地死死记住。这就未免太笨拙了。

从专家讲课这个事迹引起一种思考：讲课就是传授知识的一种方式，行之于学校的方式。在研究所，另有一种传授的方式，用通俗的讲法就是导师带徒弟。在学校也好，在研究单位也好，知识传授的做法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将要永远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学校里的教授和研究单位的研究员，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年青的一代，应被看作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在客观上存在一种教授和研究员向下一代传授知识的责任感和传授的方法和技术。在经济方面，企业要讲经济效益，在知识界，要讲知识传授效果，或叫人才培养效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实际上，企业中无时无刻要用各种统计数字来说明经济效益的状况。但在学校和研究单位用什么数字或方式来说明其传授效果呢？说起来惭愧。可能在眼下改革的热潮中犹如各种法律法规的制订那样，也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想法不为过吧？

最后一段是笔者临时感触发挥之言，若有不妥之处，恭请指正。

广西植物研究所 梁畴芬